

# 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與沒落

## 1924~1930

許 文 堂

### 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社會主義思想流派在中國傳播的經過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及沒落。

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主要由留法學生於1920年代初期引介至中國。其主要理論根據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社會改良主義，主張經由議會路線取得政權，發展工會及合作社組織達成社會化生產及分配的目標，與當時「第三國際」之暴力革命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相抗衡。然而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後並未能順利發展，主要原因：國內情勢自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革命呼聲高漲，溫和的社會改良思想未能得到共鳴，國民政府成立後實施「訓政」也限制了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國際情勢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未能實際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落實其推翻帝國資本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訴求。至於社會民主黨本身也缺乏具號召全國的人材，宣傳刊物亦薄弱，在難以推動的情況下終於趨向解體，沉寂於歷史之中。

# 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與沒落

## 1924~1930

許文堂

- 一、前言
- 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
- 三、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活動
- 四、中國社會民主黨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
- 五、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改組與沒落
- 六、結論

### 一、前 言

辛亥革命前約十年間，基於政治改革或革命之需，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自西方引進各種政治思想與主義，冀望藉此達成改變上層政治結構或進行全面政治運動的目的。<sup>①</sup>這些思潮包括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各派思想，主要經由留學生引介。待民國肇立，各派思潮雖有一時勃興之現象，甚至有中國社會黨之成立，然因政治環境不良，稍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之黨派均遭袁世凱政權之忌，以其為過激派、危害社會，而加以取締，致無法生存。<sup>②</sup>軍閥主政之下使中國面臨內外交困的危機，「五四運動」的爆發即是對此一情況的總反應。改革或革命的需求，使得此一時期的思想蓬勃發展，其中有關各派社會主義之研究也更為廣泛與深入，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即為此一社會主義運動的具體產物之一。

這種社會主義的分歧自然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組織的分歧有極其密切的

① 有關此一時期言論可參考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三卷。

②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黨，1911~19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期，民國80年6月，頁211-235。

關係。第一國際的沒落固有其複雜的外在因素，而其內部馬克思主義與巴古寧(Mikhail A. Bakunin 1814-1876)的追隨者則因對於社會主義思想詮釋的分歧而埋葬此一國際性的社會主義組織。<sup>③</sup>1889年重組的第二國際亦充滿思想路線的鬭爭，其間無政府主義者雖已完全被排除在組織之外，第二國際內部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考茲基(Karl Kautsky 1854-1938)，與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Edouard Bernstein 1850-1932)兩條路線鬭爭不已。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衝突終於引爆歐戰，各國社會主義者以自身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而讓國際社會主義的理想在炮火硝煙中消失。<sup>④</sup>

歐戰終結，在俄國取得政權的列寧(Vladimir I. Oulianov, alias Lenin 1870-1924)聯合十九國代表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三國際亦即共產國際的成立大會，正式宣告第二國際的死亡。同時，於7月成立「赤色職工國際」(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ur Union, Syndicat Rouge International)，參加者有四十二國之總工會。1920年7~8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更以「入會二十一條款」進一步要求各國社會黨全面清除改良主義、修正主義份子，並將黨名改作共產黨，凡不接受這些條款者均將開除。此舉立刻促使各國社會黨發生分裂，多數派成立共產黨並加入第三國際，少數派則仍自稱社會黨。分裂的社會主義者開始進行整合，複雜的戰後變局使這項工作進行的十分困難。1921年2月，由考茲基等原第二國際中間派與左派的社會主義者，在維也納(Vienna)舉行會議，有十三國的社會黨代表八十人參加，會中成立「社會黨國際行動聯盟」(Union des Partis socialistes pour l'action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亦即通稱之「維也納組合」(Vienna Union)或「第二半國際」(Internationale 2 $\frac{1}{2}$ , Two and a half International)，以其主張介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之間而得名。起初社會主義右派拒絕合作，然而面臨歐洲經濟蕭條、德國賠款問題、戰爭的危機，及第三國際對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干涉，雙方終於達成協議。1923年5月，這些拒絕接受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提「入會二十一條款」的社會主義者，在德國漢堡召開改組大會，宣告社會主義工人國際(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ocialiste,

---

③ Cole, G.D.H. A History of Socialism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54, vol. II. Marxism and Anarchism, 1850-1890, Ch. VIII.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p. 174-212.

④ Cole, G.D.H. op. cit. vol. III.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art I, pp. 90-103.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成立。<sup>⑤</sup>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大致上承續第二國際之社會主義理論，而內部派系紛爭如舊存在，其活動仍以歐洲為重心，主要由英國、德國、比利時、奧地利、捷克、瑞典、丹麥、法國等三十餘國之社會黨組成工人國際在該國之唯一支部。總計黨員有六百餘萬人，代表約二千五百萬之選舉得票數。其主要支部在英國為工黨，約有三百萬黨員，德國之社會民主黨約 869,000 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 570,000 人，捷克社會民主黨 200,000 人，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 100,000 人，丹麥社會民主黨 100,000 人，法國社會黨 90,000 人。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三十八人組成，國際局則由九人領導。<sup>⑥</sup>

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即是循着上述社會主義運動的潮流而組黨，並且成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中國支部。

## 二、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

熱心中法文化交流的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人所推動的勤工儉學運動在「五四」之後蔚為大觀，總計自1919年3月至1921年2月止，約有一千七百餘學生以「勤工儉學」名義赴法。<sup>⑦</sup> 大批學生赴法，使當時法國成為次於日本之第二大留學國。這些留法「五四」青年多半富改革思想，留法期間的經歷更使他們的政治意識高度覺醒。1921年2月28日爆發「二八請願」運動，約四百名學生聚集巴黎中國公使館附近，提出「生存權」、「求學權」、「工作權」的要求。此次風潮固然主要有經濟因素在內，而政治意識的推動實不可忽略。接着在七月、八月間發生反對中法秘密大借款的「兩次拒款大會」則完全是政治運動。同年9月21日的「進軍里大」事件。對勤工儉學運動造成一大傷害，10月13日計有一百零四名學生被遣送回國。<sup>⑧</sup> 政治意識高漲的結果必然走向組織化：1921年冬，無政府主義者的「工餘社」成立；1922年6月18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隨後並有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組織；1923年11月25日，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成立，並完成改組；同年12月2日主張極端國家主義的中國青年黨成立。<sup>⑨</sup> 這是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前

⑤ Donneur, André. *L'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3, pp. 16-21.

⑥ A. Donneur, *op. cit.* pp. 23-27.

⑦ 參照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812。

⑧ 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期，民國73年，頁 63-81。

⑨ Shiu Wentang, *Les organisations politiques d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entre-deux-guerres*,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thèse du doctorat, 1990.

後的旅法華人政治團體概況。

1922年冬，一羣勤工儉學生及參戰華工計約十餘人在巴黎成立「健社」。其主要成員可考者有孫倬章、陳師（天侯）、潘無我、陳俠、楊廣陶、徐特立、王乾、毛升選、韓少琦、袁少信、鄒昌平、葉長齡等人。<sup>⑩</sup>「健社」成員主張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革命有其階段性，應循序漸進。目前，「健社」之綱領已無法得見全豹，只能由當時共產黨人之批評略知一二。任卓宣筆帶嘲弄的引述綱領草案內容，『多數人怎樣團結呢？蓋人類各有良知；凡由良知發表的己見，必可得多數人的同意；團體的成立，即本于各個人的良知。』認為這些話「簡直是唯心論者底常談，失掉了社會主義本唯物史觀見地主張改造經濟組織、社會制度立場了」。<sup>⑪</sup>這種改造人心，改良社會的觀點自然不為共產黨人所喜，他認為該草案所說『釀成階級的病源，完全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制度』並不符合歷史之鬭爭事實；並以綱領中所稱之『社會民治主義改革的目的不單獨解放無產階級；並且要把現在受陷害的人類一齊解放』，『我們的主張，不欲使無產階級為將來有特權的新貴族；但期其廢除資本階級和各種有特權的階級』等語是階級觀念欠明。

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最嚴重的矛盾還是在於改良或革命的分歧，健社綱領指出『民國以來的政權，都是軍閥在操縱……中國底社會黑暗如此，社會的危亡在所不免，個人底生存豈能有幸？』似乎指出革命之必要性，但是『中國現在文化、政治、經濟的狀況都未達到大改革的程度』，必需『俟工業等物質能力進步，……然後始有大改革底機會』。「健社」成員以為生產力與經濟的發達才是改革的先決條件，要預防資本主義的弊病則需『掌握政權，變私有生產為社會化生產』，亦即肯定議會路線的重要。前引綱領內容片段的反映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觀念<sup>⑫</sup>。

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健社」的成立得到法國社會黨人或國際社會主義組織之助，或與其有所關聯。但這些旅法中國社會民主主義青年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顯然極為關心。1923年1月由舊第二國際及維也納聯盟（Vienna Union）發出「對各國社會主義工人宣言」，呼籲各國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參加五月在德國漢堡（Hamburg）召開的統一大會。「健社」派出代表楊廣陶參加這次「社會主義工人

<sup>⑩</sup> 高承元，〈關於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些情況〉，載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第三冊，頁440-444。陳師、陳俠、鄒昌平、葉長齡，皆為四川勤工儉學生，1920年12月15日赴法。

<sup>⑪</sup> J，〈健社綱領草案批評〉，載少年，第11號，巴黎，1923年8月15日，頁39-43。J，為任卓宣之筆名。

<sup>⑫</sup> 文中『』之引文均出自〈健社綱領草案批評〉，見前注。

國際」的漢堡成立大會，<sup>⑬</sup>惟此次出席應是以觀察員身分出席，因為當時中國社會民主黨尚未成立。

1924年7月14日，在巴黎西北郊哥倫布（Colombes）的一家咖啡館，「健社」召開大會正式組黨，約有五十人參加大會，中國社會民主黨於焉誕生。該黨主要政治綱領為：一、施行普遍選舉（全面直接選舉）；二、土地國有；三、發展合作社組織；四、勞動者有參預企業管理之權；五、推行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六、女工享有十二星期產假，薪資照發；七、工人有罷工、退工之完全自由；八、實行社會保險及工作到六十歲工人之養老金制度等項。<sup>⑭</sup>綜觀這些政見並無異於昔日第二國際之改良路線，希望通過議會路線、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達成社會資源再分配，將資本主義社會過渡至社會主義民主社會。

中國社會民主黨總部設於巴黎，內設幹事會、議事會及監事會。幹事會設幹事六人，議事會及監事會各有委員三人。大會選出第一任總書記汪頌魯，並決議出版「奮鬥」作為宣傳機關。此後1925~1927年間三屆大會分別選出史乃紹、王乾、陳子和為歷任總書記。<sup>⑮</sup>

### 三、中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宣傳活動

「奮鬥」創刊於1923年10月15日，刊頭有法文標題 *la revue de la lutte gigantesque*，後來改作 *Le Combat*。該刊起初在上海及巴黎兩地編輯，國內由孫倬章主編，巴黎由徐特立、陳師二人主編，為不定期刊物，交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印刷，由泰東書局代為發行。<sup>⑯</sup>其後之編輯、印刷完全在巴黎進行，通訊處設於 n° 10 Boite Postale Bois-Colombes。在巴黎之發行人由法國人 G. A. Bernard 擔任，至於他與該黨之實際關係則不清楚。

該刊之宗旨雖說在於「討論社會主義」。事實上，作為黨之機關，它主要在宣

<sup>⑬</sup> 高承元，前引文，頁440。

楊慶陶（1899~?）湖南長沙人，湖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入北京法文專修館參加動工儉學，1920年6月抵法。1924年自 Saint-Born 農業學校畢業。1929年考入里昂中法大學，1933年畢業離校。

<sup>⑭</sup> 高承元，前引文，頁441。

<sup>⑮</sup> 同上。汪頌魯（1898~）貴州動工儉學生，貴州師範學校畢業後與黃齊生、王若飛等人赴法。1920年1月抵法後入 Saint Germain 中學，與尹寬、鄭超麟等人同學，會同組「自明社」。尹、鄭二人後皆成共產黨人，汪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史乃紹（1898~）湖北沔陽縣動工儉學生。王乾（1900~）四川華陽縣動工儉學生。陳子和（陳邦政）湖北大冶人。

<sup>⑯</sup> 〈奮鬥雜誌簡章〉，奮鬥，期1，1923年10月25日。徐特立，原名懋恂，字師陶，湖南善化人（1877~1968），長期在長沙教育界服務，頗有名氣，曾任長沙師範學校校長，赴法動工儉學之湘生有多人為其學生。1919年11月亦赴法動工儉學，初為社會民主黨人，1924年返國，至1927年夏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南昌暴動。

揚社會民主理論。在一篇名為〈中國的難題怎樣解決〉的文章中，作者認為中國目前和未來的社會難題在於政治不入軌道，軍閥專橫，及將來的資本主義的恐怖。這些難題肇因於中國人「無政治的常識，無參與政治的能力」，「富於和平性，抵抗力薄弱」及「缺乏社會化生產」。<sup>①</sup>作者提供之方法在於：第一，「傳播社會主義，使士農工商七十二行的人，各結為堅固的團體，聯合一致，反抗軍閥。這類七十二行的人，多數是無產階級的人，以社會主義號召，始容易團結」；第二，「傳播社會民主主義，蓋社會主義的社會，無產階級必常為社會所重視，所以歐美的知識階級的多數，常與無產階級聯合，倘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學理昌明後，知識階級也必然要向無產階級聯合，與無產階級交際往還，果能如此，則中國之民十之七八的貧民始有輸入政治常識和參與政治的機會」；第三，「實行社會化的生產以代替資本化的生產」。由此，得出之結論是社會民主主義乃唯一的出路。根據作者的意見，馬克思主義分為「社會民主（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即波爾斯維克主義）兩派，……後一派不宜於中國，中國現在應採的為前一派」，因為「社會民主主義一面反抗紳士的階級政治，期其達到全民政治的真正民主政治；一面推翻資本主義，主張社會化的生產，循序漸進，務求達到真正社會主義的社會，故欲解決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和將來的經濟問題，只有社會民主主義為最良的方法」。<sup>②</sup>

對於社會革命之分析，另一位成員在〈中國人心的解剖及革命應取的方針〉文中提出特別的觀點：「革命並不是一樁驚天動地的事業，若無必要機會，亦不必以殺人毀屋的手段。大凡一個東西的陳謝，一樁事業的變遷，凡一點一滴的工夫，只要可以催促進化的速度，增高公共的幸福，都可以叫做革命」。<sup>③</sup>作者又認為革命並非單憑主觀意志即可實行，故而主張以協社制度發展生產以限制資本家之產生；通過普遍選舉，進行地方自治以便準備改革。<sup>④</sup>這些觀點似乎吻合後期考茲基的中間改革路線，認為演化成爲社會主義勢在難免，並且放棄資本主義崩潰之必然性。相較之下，「奮鬥」在1926年2月刊載的中國社會民主黨宣言就帶有「革命性」。<sup>⑤</sup>

① 孫偉章，〈中國的難題怎樣解決〉，奮鬥，期1，1923年10月25日，頁3-4。

孫偉章爲四川勤工儉學生，赴法前爲「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刊物「星期日」周刊社員，健社成員，在法期間與少年中國學會成員，尤其是會琦，多有往還。1923年3月間返國，1929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改組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任組織部長。

② 同上。

③ 大鳴，〈中國人心的解剖及革命應取的方針〉，載奮鬥，期1，1923年10月25日，大鳴即鄧大鳴，（1897~ ）四川巴縣勤工儉學生。

④ 同上。

⑤ 〈中國社會民主黨宣言〉，奮鬥，期26，1926年2月25日，頁2-4。據記者附言，本宣言在去年（1925）11月29日即已「公布中外」。

宣言首先分析世界與中國之情勢，認為「要改造此等惡劣現象只有堅固的團結起來，消滅世界的資本家；但事實上却不然，一、一般武人政客利用游民兵匪來實行與資本家類似或更甚的掠奪行爲；二、大多數紳士見着外國資本家那樣闊綽也想爬上資本主義的臺子以遂貪慾；三、一般號稱智識界的人見着外資侵掠也反對外國資本家，但又以爲中國病源在貧窮，非資本主義不能醫治，既有了上面三種原因，又兼以後進的無產階級尙少階級覺悟，所以在國際經濟侵掠之下的中國，便沒有相當的反動（應）了」。<sup>②</sup>宣言稱「要打倒國際資本主義和類似資本家的人們，只有喚醒中國民衆，聯絡世界勞動階級，反對國際侵略，從事社會革命；但是要達到這種目的，只有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所以我們組織中國社會民主黨」。至於資本及階級鬭爭問題，宣言揭示之綱領可歸納如下：一、進行革命以廢除資本性生產，實行社會化生產以消滅階級；二、成立工團及合作社組織以限制資本生產力；三、經由議會路線及其他可能的途徑奪取政權；四、聯合世界無產階級以消滅全世界資本家。

但是中國社會民主黨強調「不是爲無產階級爭特權，只在廢除資本和治人階級，而達到無男女、無種族的區別，人人負平等的責任，享平等的幸福」。爲實現社會民主主義，該黨之主張可分爲政治及經濟兩方面。

政治方面：

- 一、主張無記名投票的直接普通選舉；
- 二、人民有建議（創制）與拒絕（複決）之權利，直接行使立法權；
- 三、鏟除軍閥；
- 四、實行地方自治；
- 五、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完全自由權；
- 六、實施普及教育和社會教育；
- 七、確定保護勞工法；
- 八、改良司法；
- 九、男女平等；
- 十、反對宗教。

經濟方面：

- 一、採取大實業及信用機關公有制（國、省、縣有）；

---

② 同上。



- 二、努力於協作社和工團的組織；
- 三、提高農工生活；
- 四、以累進稅則調所得稅、遺產稅；廢除必需品的間接稅；
- 五、限制大地主；
- 六、繁盛口岸的地方收歸市有。<sup>23</sup>

不同派別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論戰。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黨人之爭論事實上是承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與共產國際的爭論而來。主要的議題集中在社會主義的正統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評價上。雙方自然均以馬克思主義為宗，並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自居。惟社會民主主義者以革命是因社會環境條件成熟而產生，在資本主義生產力仍在發展階段時，資本主義社會即無法推倒，故而科學社會主義之實現是有階段性的，如果以暴力超越階段，徒然流無益之血，失去革命成果。而共產黨人則肯定暴力革命，並以無產階級專政為馬克思主義者之試金石。為此，大革命之後的俄國所發生的現象均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之良惡的批判對象。舉凡外交政策、婚姻制度、官僚體制等均有所批評。<sup>24</sup>甚至直指蘇俄為「紅色帝國主義」。<sup>25</sup>上述的批評觀點和當時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國家主義者的論點均甚類似，堪稱「通俗」。

面對社會民主黨的批評，共產黨人並非毫不為所動，但基於聯合陣線之策略，對社會民主黨並未展開針鋒相對的筆仗而僅作溫和的批評，指其缺乏革命精神。<sup>26</sup>

事實上，當時的國民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均以青年黨為最大共同敵人，認為青年黨的國家主義實際乃反革命與法西斯主義。

因此，「奮鬥」刊載大量批判青年黨的文章。在〈怎樣奮鬥〉一文中，作者指出「國家主義的目的是在做強一國和強一種的迷夢」，「受國家主義教育的影響，不過養成吾人自驕欺人的觀念，和嗾使吾人做人類自殺的罪惡罷了」。<sup>27</sup>另一篇論著〈國家主義的解剖及消滅〉有系統的闡明國家之起源在於經濟關係之發展，為維持秩序及制度而產生的組織。他認為國家之性質在根本上具有侵略性，國家發展至

<sup>23</sup> 同上。

<sup>24</sup> 止良，〈蘇俄的外交政策原來如此〉，奮鬥，期27，1926年3月10日，頁2-3；陶園，〈奇離的蘇俄婚姻制度〉，奮鬥，期27，頁3-4；歐陽瑩，〈布爾塞維克的恐慌〉，奮鬥，期27，頁11-13；楚良，〈蘇維埃的暴政〉，奮鬥，期33，1926年6月10日。

<sup>25</sup> 中國社會民主黨，〈為五州慘案告全世界無產階級書〉，1925年6月，重刊於奮鬥，期32，1926年5月25日，頁10-11。

<sup>26</sup> J，〈健社綱領草案批評〉，前引文。

記者，〈不愛國和不革命〉，奮鬥，期27，頁2。

<sup>27</sup> 宋魯，〈怎樣奮鬥〉，奮鬥，期26，頁5-7。

資本主義階段，其法律與政治全為維持資本階級之需要而產生，國家乃成爲「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至於國家主義之危害，作者以第一次大戰爲例，指出無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均付出慘重的代價，整軍備武和割地賠款均由人民承受痛苦。因此，作者樂觀的預測國家主義之必然消滅，因爲內在經濟之衝突，無產階級不斷增加而覺醒，通過議會取得政權，則原來有利於資本家之國家主義的法律制度必然崩壞；外在則因國家主義之侵略性受全世界各國社會黨的反對終將無發展餘地；例如 1925 年法國進軍摩洛哥，內閣因社會黨之反對而倒閣，「五卅慘案」發生時英國工黨亦反對本國之政策皆爲明證。<sup>⑳</sup> 本文立即引起青年黨人的反駁，1926 年 4 月 17 日的青年黨機關「先聲」，刊載胡國偉〈一篇不應做而又不能不做的文章〉。隨後在 4 月 25 日出刊的「奮鬥」第 30 期又刊出皮應麟的反駁文章，雙方展開解釋名詞大戰。<sup>㉑</sup> 此後每期「奮鬥」均有對國家主義或針對青年黨之批評，主要以其「復古」、「反革命」、「反經濟」、「法西斯蒂」(fascisti)、「帝國主義走狗」等不一而足，與國民黨、共產黨對青年黨之批評相似。中國社會民主黨人將青年黨人與義大利法西斯黨人相比擬，無疑是秉承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撻伐。尤其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之黑衫隊進行一連串暗殺社會黨人的活動已經引起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憤慨而大加聲討。

旅法左翼青年對青年黨人之惡感固然起初源於政見不同，由論戰進而在集會爭吵，甚至於以手槍相向。<sup>㉒</sup> 在巴黎的「五卅」運動則是雙方最高決裂點。「五卅」事件消息傳到巴黎之後，旅法華人展開一連串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1925 年 6 月 21 日，在任卓宣帶領下，約兩百名中國青年占領駐法公使館，強迫公使陳籙簽署三封電文，其一爲通告法國新聞界有關「五卅」之真象；其二爲致法國政府，抗議其帝國主義政策，要求禁止派兵前往上海；其三爲告國人電，表達公使及全體華人對反帝運動的支持。<sup>㉓</sup> 事後法國當局逮捕六十七人並予以驅逐出境，<sup>㉔</sup> 另外約有五十

<sup>⑳</sup> 皮應麟，〈國家主義的解剖及消滅〉，奮鬥，期 28，1926 年 3 月 25 日，頁 5-14。

皮應麟，四川勤工儉學生，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畢業。「五四」時爲成都「愛國會」會長，全川學生聯合會代表。當時主辦「威克列」(Weekly) 周刊，並成立「平民啓智社」，推展平民教育運動，收有學生三百餘人。

<sup>㉑</sup> 皮應麟，〈駁『一篇不應做而又不能不做的文章』〉，奮鬥，期 30，1926 年 4 月 25 日，頁 8-16。

<sup>㉒</sup> 參閱胡國偉，巴黎心影，臺北，菩提出版社，民國 60 年，第九章。青年黨之「鐵血青年團」似乎擁有強大火力。

<sup>㉓</sup> 任卓宣，〈旅法華人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留法青年黨人的告密〉，嚮導，期 133、134，民國 14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30 日。關於此次進佔公使館事件比較深入之研究有 Nora Wang “《Da Chen Lu》打陳籙——Le Mouvement du 30 mai 1925 à Paris”，in *Approches Asie*, n° 7, 1983.

<sup>㉔</sup> 法國國家檔案館 A.N. F7 12900.，

餘人自動離境前往比利時。<sup>33</sup> 這次事件導致許多領導人被迫離境。由於當時青年黨人何魯之任職勤工儉學生總會幹事，很可能在法國警方查詢時提供名單與地址，任卓宣遂指控其向法警告密。<sup>34</sup> 青年黨人利用法國警方驅逐持不同政見同學的說法，普遍為當時旅法華人所接受，故而引起同仇之愾，不恥其所為。一份警局報告顯示，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決意殺害青年黨人以為報復，但這項不確的消息可能是來自一位代名「中國人」的告密者。<sup>35</sup>

在聲援「五卅」運動期間，中國社會民主黨印發中外文傳單各兩萬份，分寄國內外各地。<sup>36</sup> 其中文宣言〈為上海反國際侵略敬告國人〉稱：

我們相信中國的被壓迫祇有羣衆運動才能解決，這羣衆運動的責任祇有中國的平民才能負擔，也祇有國際無產階級聯合才能收實效。看呵！我們的政權落在誰人的手裏？關稅操於列強，郵傳鐵道為列強所壟斷，良港要隘為列強所占據。我們的經濟地位怎樣？外貨充滿市場，外國的銀行工廠遍佈全國，所謂二十年前的自食者，手工業小商人，現今都變成了游民和兵匪，這不是受了國際資本侵略之賜麼？這不是殖民地的現象麼？

中國的無產階級，你們快覺悟罷！這如狼似虎的國際資本侵略者在他們的本國雖剝奪了工人勞力的剩餘價值，然而他們工人還能減價賣他們的勞力給資本家，在中國則使我們竟無賣勞力的餘地了！我們為要制止這凶惡的國際資本侵略，非與全世界的同情者——無產階級——聯合不可！起呵！」<sup>37</sup>

〈告全世界無產階級書〉旨在說明「五卅」運動並非仇外行動，而是勞工反對帝國主義與國際資本家之壓迫。文中並呼籲全世界無產階級給予協助，督促各國政府不用武力干涉中國，拋棄不平等條約，制止帝國資本主義在華的掠奪。<sup>38</sup>

社會民主黨既然宣言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則其加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 (I. O. S.) 也就順理成章。

#### 四、中國社會民主黨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

早在 1905 年 5 月孫中山即嘗試與第二國際建立關係，以取得對革命之助力。

<sup>33</sup> Le Matin, du 25 06 1925.

<sup>34</sup> 任卓宣，前引文。另見宋魯，〈斥中國的法西斯蒂〉，奮鬥，期33。

<sup>35</sup> A. N. F7 12900.

<sup>36</sup> 記者，〈本報去年反國際侵略號中的幾段文字〉，奮鬥，期32，頁 10-13。

<sup>37</sup> 同上，頁10。

<sup>38</sup> 同上。

⑳ 先是留比利時學生賀之才介紹於岡城 (Ghent) 社會黨領袖華靈東之前，因得識 Camille Huysmans (1871-1968) 及 Emile Vandervelde (1866-1938)。㉑ 當時 Vandervelde 為「社會主義國際局」(Bureau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 二人執行委員會常委之一，但這些晤談顯然未能得到孫中山所期待的援助。當時荷蘭社會黨領袖 Van Kol 即多次在信件中建議俄國社會黨人 Roubanovitch 及 Huysmans 避免參與中國事務，並批評孫中山「也許是個理想主義者，却絕不是個有能力的人」。㉒ 這種對孫中山的保留態度一直持續到歐戰前夕，此時孫中山因「二次革命」而流亡日本，他猶對第二國際懷抱幻想，曾寫信給國際局 (BSI) 呼籲國際「協助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㉓ 當然，第二國際在歐洲已自顧不暇，這也導致日後孫中山向共產國際尋求援助。

與共產國際積極在亞洲的發展相較，社會黨人顯得過於以歐洲為重心。顯然，社會黨人也注意到這種傾向，故而1923年5月在漢堡的成立大會上，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發出公開信，邀請歐洲地區以外的各國社會黨人皆能加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㉔ 此次漢堡大會，「健社」曾派代表楊廣陶參加。因此，1925年8月在法國馬賽召開的第二次國際大會，中國社會民主黨即正式加入，成為社會主義國際中國支部。㉕

馬賽大會召開之時正值「五卅」運動爆發不久，國際執委 Otto Bauer (1882-1950) 提出一份關於遠東戰爭危機報告。㉖ 他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推倒中國所有的城牆，而無數長期被奴役被歧視的中國人民已經覺醒，勢必愈來愈難維持此種制

㉑ Le Peuple, n°140, le 20.05.1905.

M. Rachline, "L'Internationale et la révolution en Chine", in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et l'Orient, G. Kaupt et M. Reberieux, ed. Paris, Cajus, 1967, pp. 49-58.

㉒ 賀之才，〈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收馮自由，革命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35年再版，第二集，頁135-141。

文中所稱之加美利好士萬及意邁爾雲地威提二人即 Huysmans 及 Vandervelde 二人。Huysmans 為比利時重要社會黨人，1910年當選國會議員一直至去逝為止。1940年曾任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主席。Vandervelde 自1894年起即任國會議員至1938年去逝，1900年第二國際成立社會主義國際局 (B.S.I.) 即任二人執委之一。1914年曾到華訪問，回比後著有 *A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Soviets et Kuomintang*. (1931)

㉓ Rachline, M. op. cit., p. 56.

㉔ Ibid. p. 58.

㉕ 《Circulaire de l'I.O.S.》，in Deuxi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ocialiste à Marseille, Bruxelles, Imprimerie Coopérative Lucifer, 1925. p. 73.

㉖ 奮鬥，第26期，4頁。

㉗ Otto Bauer 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改良派領袖，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行政委員會成員。Deuxième Congrès de l'I.O.S. à Marseille, pp. 359-372.

度」。<sup>46</sup>然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似乎僅止於觀察，也許共產國際對國共統一陣線的支援，使其對中國革命的浪潮持一種保留的態度。沒有確實的資料可以瞭解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國民黨主導的北伐作何種評估？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是否允許其中國支部參加此一革命陣線？

根據中國社會民主黨駐國際代表楊廣陶於 1927 年 2 月 12 日在國際執委會的報告則可以看出中國支部的態度轉變。報告表明對廣州國民政府的肯定態度，認為「它既非排外，亦非布爾雪維克，而是由國民黨領導的民主政府。它事實上包括三種派別：一、民族主義派，即國民黨右翼；二、民主派，即國民黨左派，目前最具有政治影響力，因為它符合反對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訴求；三、共產派，此派俄國人為數不少，並不能獲得中國人民的信任，其影響力幾乎不存在。布爾雪維克主義只不過提供藉口，讓外國人來決定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sup>47</sup>這種粗糙的分析表現出唯心觀點。

楊廣陶表明中國社會民主黨將不畏任何困難保持馬克思主義的面貌，公開為宣傳主義及組織無產階級力量而奮鬥。<sup>48</sup>中國支部熱切的表達對主義的忠誠信仰，其目的無非在於尋求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支援。中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工人階級愈來愈覺醒，有利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但要贏得人民的信任，則有賴於國際之助。其方法為各國支部及國際對帝國主義者施加壓力，達成四項目標：一、外國軍隊立即撤出，並禁止再派武力至中國；二、中國海關自主；三、取銷租界及領事裁判權；四、取銷所有有礙中國獨立之不平等條約，另訂平等新約。<sup>49</sup>

中國社會民主黨所期待的國際援助得到法國社會黨 (SFIO) 的聲援。三月初，法國社會黨在巴黎共濟會 (Grand-Orient) 召開聲援中國革命大會。<sup>50</sup>多位法國社會黨領袖 Osmine, Jean Longuet, Ziromski, Léon Blum, Henri Fontanier, Bracke 等人，均出席發言表達對南方國民政府的支持。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譚天塹再度呼籲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位國民黨代表尹光彝則發言指出「一個曾經遭受鴉片戰爭的民族再也不能以語言的鴉片為滿足」，他坦白的表明，口惠而實不至並無益於革命，只有實際行動才能生效。尹光彝指出：「只要你們願意，你們就能夠

<sup>46</sup> Ibid.

<sup>47</sup> Yank Kantao, "Les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s chinois et l'action socialiste", in *La Nouvelle Revue Socialiste*, n° 14-15, Paris, 1927, pp. 163-168.

<sup>48</sup> Ibid.

<sup>49</sup> Ibid.

<sup>50</sup> *L'Humanité*, le 5 mars 1927.

達到這個目標。社會黨在議院有超過百名的議員，並且控制一部分的工會，對於要求政府撤軍的事為何仍遲疑不決？你們不僅要對英國帝國主義作戰，也必須和法國本身的帝國主義者作戰」。<sup>⑤①</sup>

一名法共青年團代表 **Reymond** 同樣的表達共產黨與革命無產階級的團結，他呼籲採取禁運措施以制裁張作霖，並對國民黨予戰鬥物資援助。<sup>⑤②</sup>

確實，不論在集會聲援、募款活動等方面，法國社會（SFIO）黨和法國共產黨（PCF）相形之下，對於中國革命的支援顯得薄弱。這表明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對於共產國際介入中國革命的作法深懷戒心。因此，國共分裂後，蔣介石委員長發表聲明：「希望列強支持自布爾雪維克解脫的中國國民政府」，的確免除不少疑慮。<sup>⑤③</sup>

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第三次大會於1928年8月在布魯塞爾（Bruxelles）召開，會中一名英國代表祝賀中國幸運的統一。<sup>⑤④</sup>然而，中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楊廣陶的意見正好相反。他指出統一之後的中國人民仍繼續遭到國際帝國主義的剝削，工人階級仍然受國內政治的迫害。他並且指控國民黨是「恐怖專制的政權，屠殺大批工人，破壞工人運動，摧毀無產階級組織；不僅以恐怖手段對付布爾雪維克份子，也以同樣手段對待社會主義者，毫無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可言」。<sup>⑤⑤</sup>儘管如此，中國社會民主黨仍然表示有限度的支持國民黨進行改良政策，即裁軍限武，保護無產階級，建立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不失樂觀的表示「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只達成資產階級革命，從今以後吾人將致力於無產階級革命。過去與現在是屬於國民黨的，而未來是屬於我們的」。<sup>⑤⑥</sup>這種堅定樂觀的革命精神自然贏得大會熱烈的掌聲，除此之外，國際確實也不能提供任何具體的支援。同時，在改良或革命之間猶疑和對國民黨支持的程度已經使中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分歧面臨不得不改組的地步。

## 五、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改組與沒落

1923年多，一羣里昂中法大學學生組織一個政治學社，「競社」。主要成員有

<sup>⑤①</sup> Ibid.

<sup>⑤②</sup> Ibid. 法國共產黨於3月4日也在里昂(Lyon)召開聲援大會，約有四千人參加。見 *L'Humanité*, le 6 mars 1927.

<sup>⑤③</sup> 《Un important message du général Tchang Kai-chek》, *Le Petit Parisien*, le 23.04.1927.

<sup>⑤④</sup> Troisième Congrès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ocialiste, Bruxelles du 5 au 11 août 1928, ed. par le Secrétariat de l'I.O.S., Zurich, 1928, VI. p. 68.

<sup>⑤⑤</sup> Ibid.

翟俊千、張雲、張務源、黃巽、何衍璇、何其昌、黎國材等數十人。<sup>56</sup>根據當時里昂中法大學校長 Favre 及警方調查，「競社」傾向社會主義改良派，即激進社會主義 (radical-socialism)。<sup>57</sup>法國的激進社會主義起源於「七月王朝」(1830~1848) 期間發展的反對黨運動，主張民主政體、全民投票及社會改良政策，由於其民主、共和主張是對專制王朝作根本性 (radical) 的變革，故而得名。其重要成員多為自由主義者、共和派份子、大學教授等，但實際上至 1901 年始組成法國第三共和 (1870~1940) 的第一個政黨，具有實證精神的理性主義色彩、反宗教精神、強調個人主義及維護自由與私有財產權，但並不排除社會改革之必要等理念，實際上代表中產階級的精神，在法國第三共和具有重要影響。曾多次參與組織政府內閣。在政治系譜上，屬於中間偏左的派別。相形之下，共產黨與社會黨較其更為激烈。顯然，「競社」的社會改良思想在當時左右兩派皆高呼革命的環境下顯得過於溫和。<sup>58</sup>

「競社」總部設於里昂，於巴黎設支部，成員約有五、六十人。部分成員回國後在各地發展組織吸收社員約五百人。1925年、1926年分別在北京及廣州召開代表大會，決議將總部遷往北京，後再遷廣州，並通告全體社員加入國民黨。<sup>59</sup>

1929年間，部分「競社」成員由於對國民黨之政策感到失望，遂脫離國民黨，加入中國社會民主黨。首先由高承元、張務源、翟俊千等人加入社會民主黨上海支部，促成次年3月的重組大會。<sup>60</sup>

1929年3月，中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決議解散「競社」，邀請「競社」成員加入社會民主黨。本次改組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九位，

<sup>56</sup> Ibid.

<sup>57</sup> 翟俊千 (1892~ ) 廣東公費生，1921年10月入里昂中法大學，習法科，1927年獲博士學位。返國會任教中央大學。

張雲 (1896~ ) 廣東公費生，1921年10月入里昂中法大學，習理科，1926年6月返國。

張務源 (1900~ ) 河南人，為1922年12月入學之校費生，1927年離法。

黃巽廣 (1898~ ) 東公費生，1921年10月入校，習理科，1926年7月畢業返國。

何衍璇 (1902~ ) 廣東公費生，1921年10月入校，習理科，1925年畢業返國，曾任教上海大夏大學。

何其昌 (1895~ ) 河北人，為1921年10月入校之校費生，習醫科，1924年7月畢業返國，在北京西山療養院工作。

黎國材 (1894 ) 廣東公費生，1921年10月入校，習法科，1928年10月畢業返國。

<sup>58</sup> A. N. F7 13438 dossier 4.

<sup>59</sup> 曾琦「旅歐日記」1924年6月28日「(在 Lyon) ……子柱來，約同赴一咖啡店，與競社主要分子翟俊千、黎國材兩君晤談良久。渠等主張改良而反對革命，予謂革命本為不得已之手段，猶之醫者之施刀矣，然苟非癰疽，必不奏刀也。……」曾琦，曾慕韓先生遺著，臺北，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民國43年12月，頁464。

<sup>60</sup> 高承元，前引文，頁442。

<sup>61</sup> 同上。

分別為楊廣陶、孫倬章、高承元、韓少琦、翟俊千、張務源、魯成、黃其弼、王培驥。總書記由高承元出任，組織部幹事孫倬章、宣傳部幹事翟俊千、駐國際（I. O. S.）代表仍由楊廣陶擔任。社會民主黨並決議出版「青天白日」半月刊作為宣傳機關，高承元、孫倬章為總編輯。<sup>②</sup>

改組後的中國社會民主黨計有黨員四百餘人，分屬巴黎、上海、北京、廣州、成都、天津、鄭州、萬縣、貴陽、昆明、梧州、曲江、惠州等支部，由此可知皆為人數甚少之團體。根據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統計，1926年中國支部計有黨員三千五百人，1928年中國支部成員有七千人。<sup>③</sup>如果此項統計數字無誤，顯示中國社會民主黨在1928年後黨員大量流失的狀況。儘管社會民主黨人力圖發展，在北京支部出版「晨光」半月刊，成都支部刊行「民力日報」，上海支部則發行「窮漢」三日刊。但這些努力顯然效果不大。面對現實政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思想遭到嚴重考驗，在理想幻滅之餘，社會民主黨的活動漸趨停頓。

如果社會民主黨並未完全被遺忘則要歸諸於一些悲劇。1931至1932年間，共產黨以清除「社會民主黨份子」的名義，在閩西地區殘殺六千人以上。這次「肅清社會民主黨份子運動」實際上完全是黨內路線鬭爭的冤案，其中並無社會民主黨人在內。<sup>④</sup>民國22年11月的「閩變」事件中，社會民主黨的名稱再度和「生產人民黨」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聯繫在一起。<sup>⑤</sup>事實上，並無證據顯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與此次事件。

## 六、結 論

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是以一羣留法學生為主幹，希望經由在西歐觀察、研究所得之社會民主主義以達成解救中國苦難，進而完成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這個理想在很短暫的時間之內終歸破滅，究其原因可從下列各方面檢討。

第一，國際關係，中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恰好反映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企圖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建立支部的失敗過程。雖然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也仿效共產國際成立殖民地部，但是它完全未能提供人員之組訓，武器裝備等實質的援助。而且，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之各歐洲國家支部，仍然以歐洲為中心本位，對於中國問題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Troisième Congrès de l'I.O.S....., op. cit. Statistique.*

<sup>④</sup> 邱松慶、孔永松，〈閩西蘇區「肅清民主黨事件」淺析〉，廈門大學學報，1983，4期，頁37-45。

<sup>⑤</sup> 蔣中正，〈告剿匪將士及全國各軍長官書〉，民國22年11月23日。



之關注似乎仍在自身執政利益的終極考慮，這種議會路線自然對本國資本之發展有其依賴性，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自然使中國社會民主黨失去存在的重點。

第二，國內環境，自「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國內要求革命的浪潮逐步高漲，以改良爲主的社會民主思想自然存在發展的困境。在經濟方面，工會組織與合作社的推行皆需有安定的環境。在政治方面，議會路線在當時之中國更屬空談。政治與經濟條件二者皆缺，該黨之推動自然難以發展。

第三，理論宣傳方面，中國社會民主黨缺乏具全國性知名之士的支持，亦復未能刊行全國性具影響力的宣傳機關報，故而其主要宣傳活動陣地局限在法國，或由黨員分散各地組織地方性的小社團，其影響有限。「五四」時期發生的「社會主義問題論戰」繼「問題與主義」之爭展開。其後，社會民主黨人亦未能就其主義與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所鼓吹之調和改良思想有所釐清，致使一般青年產生認同困難。

第四，在組織動員方面，基本上，社會民主黨的羣衆基礎與共產黨之羣衆相互重疊，然而中國社會民主黨却缺乏實際能力。其組織也不夠嚴密，也未能像國民黨有既成之政治組織，或法統依據可供發展，自然降低在羣衆之可信賴程度。

外在環境的影響和內在的缺陷終於使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受到摧折，終於在歷史中歸於沉寂。